

作家访谈

我写作越来越挑剔,希望有更好的细节,尤其语言,不容易使自己满意,我的要求是,雅俗共赏,所谓“雅”就是书面,所谓“俗”就是口语,冯梦龙整理的《山歌》《挂枝儿》一直是我追求的境界。

王安忆:我一直延续写实主义的路数

■本报记者 舒晋瑜

《考工记》出版之前,王安忆曾考虑过另外一个名字,叫“老友记”。

出生世家的陈书玉,历经战乱,回到考究而破落的上海老宅,与合称“西厢四小开”的三位挚友,憧憬着延续殷实家业、展开安稳人生。然而,时代大潮一波又一波冲击而来,文弱青涩的他们,猝不及防,各奔东西。陈书玉在与老宅的共守中,共同经受一次又一次的修缮和改造。老宅最后的“修房计划”作罢,大木匠也走了。事情兜一圈回到原初。后进的房屋全塌了。这宅子日夜在碎下去”。小说中大虞去世后陈书玉在他棺前地上的一坐,令人潸然泪下。

“老友”虽是情节的重要部分,王安忆最终还是觉得“考工记”有古意,辐射也宽广些。《考工记》是王安忆写过的又一部低回慢转的上海别传。

中华读书报:《考工记》,这部写老宅命运、写上海“小开”的命运,为什么也叫《考工记》?看此书,我最感到疑惑的,就是书名和内容有些吻合,但并不完全吻合。

王安忆:《考工记》当然是借用古代营造工艺官书名无疑,就像小说《长恨歌》的取名法,从字面看,故事以老宅子颓败修葺为线索,同时隐喻人在历史变迁,时代鼎革中不断修葺,终成结果,应是切题的。

中华读书报:历史风云在小说中只是背景,往往一笔带过,但是读者已经一目了然。如此淡化时代背景,这样的处理方式出于怎样的考虑?

王安忆:小说中人物可说穿越时代而来,不能说“一笔带过”,其实是当背景,每一时间段都迫切应对,压力重重,扭转生活走向,历史在个体命运中的体现不像教科书上的概念,而是具体的人和事,所以我不同意所谓“背景”的说法,而是前景,或者说是整体的情节。

中华读书报:小说写了几位上海小开,但是和我们想象中的小开又完全不同,这是一群有教养、有规矩、有抱负的上海青年,不止是对各自的人生有脚踏实地的追求,对待女性也有礼有节。尤其是陈书玉,他心中的偶像是冉太太,遇上不那样的人,宁可选择独身。这样的一群上海青年,有多大的典型性或代表性?

王安忆:“小开”是上海坊间对老板的儿子的称谓,就像今天所说的“富二代”,和草创天下的第一代不同,他们生活优渥,接受良好的教育,在都会城市西式生活方式里,培养了绅士风度。陈书玉这样从旧时代过来的人,进入新时代困难重重,冉太太于他不止是“偶像”,更是同时代人,他终身未娶,还因为目睹周围,生育女简直是“造孽”。至于“典型性”和“代表性”,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曾写过一篇小文,主张“四个不要”,其中一个“不要”,就是不要“典型性”,我更重视个体性。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的几个女性形象,美好而生动,大虞的乡下女人,“胆壮,不畏前畏后”,朱来的夫人冉太太的风范,即使丈夫被关进监狱去求人,也无“卑屈之态”;学校的女书记,一个经历了战争的历史时,会受到强烈的情感冲击。女性在您笔下总是自强自立,在狂乱世事中独挡一面,性格心理着墨不多,却跃然纸上。就想,在写这些女性形象的时候,您的心里也应该十分强大并且满怀美好吧?

王安忆:我倒是无意识在这一部小说里树立女性形象,若要论及这一点,大约出于惯有的意识,女性比较男性适应度更高,我母亲有一个观点,说男性很硬,像钢,但一折就断,女性呢,就像蒲草,很软,但是柔韧,百折不挠。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有一个非

常重要的人物“弟弟”,不是奚子的弟弟,只是一个称呼,小说中也始终“弟弟”称呼,而“弟弟”的多处出现,又总是重要的场合,有着重要的见解,“弟弟”在小说中承担着引路人的角色。但描写也比较含糊,有一种神性的气息——是有特别的用意吗?

王安忆:小说是世俗的艺术,它要求现实的合理性,要让陈书玉在新社会立足,需要条件,所以就必须创造机会,为他开辟通路,“弟弟”是一顶保护伞,同时,他随“弟弟”一行去大后方,再一个人回家,就有了和老宅子独自相守的时间,于是,开始了终身为伴的命运。

中华读书报:无论是婚姻大事还是老宅的处境,小说里多次出现“顺其自然”。这也是小说人物命运的走向,是否也是您的一种人生态度?

王安忆:所谓“自然”,其实是不可抗力,风云变幻,连“弟弟”这样接近政权核心的人物,都不好说个定准。然而,在这不可测之中还是有所测,那就是——“变”,小说中人自有走向,不能简单视为作者的代言人。

中华读书报:《考工记》很多叙述含蓄,而且结构紧密。这样的叙述手法,您是希望留给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吗?

王安忆:这是小说者的本职,写作的时候,不会那么自觉地选择什么“手法”,也不会考虑给读者什么效果,而是因势进行,走到哪里算哪里,多少有一点命运感。

中华读书报:为了维护老房,陈书玉收拾不胜补的破绽,甚至在台风来临之际索性扑倒,像断墙一样压在被狂风吹起的油毡上。读到这里特别感动,陈书玉对老宅,对传统文化的爱护和维护,却最终因家人索要赔偿得不到完善的解决拖延下来,结尾“那堵防风墙歪斜了,随时可倾倒下来,

就像一面巨大的白旗”——这么写有何隐喻吗?

王安忆:从广义说,小说中的任何事物都是有隐喻的,狭义上则具体事具体分析,说它“白旗”,首先是由事实规定,因墙面是白的,小说方开场,陈书玉走近老宅时,第一眼看见的就是这面白色的墙,最后当它作“白旗”,一是老宅在坍塌,另外,多少有一点降将的意思。

中华读书报:这几年您的写作,无论是《天香》还是《考工记》,都有古典文学的气息,写作的内容,也都关乎中国传统文化,当然各有侧重,比如《天香》以江南“顾绣”的源流为线索,描写晚明时上海乃至中国民间生活、社会文化的面貌的背后,其实也有一点对上海资本主义的反思。而《考工记》在追寻城市发展史的过程中,更有“眼看着楼塌了”的无限悲凉。能否具体谈谈,《考工记》的写作对您而言,有怎样的挑战或意义?

王安忆:我好像不觉得有悲凉的情绪,《天香》的“眼看着楼塌了”,同时眼看着四野盛开,赵昌平先生评论《天香》,有句子:“蓬开蓬落,而又化身千红”,就是指这个吧!新旧更替,是历史规律,《考工记》写的还是人,那老房子迟早要夷为平地,即便重建,也是当旅游景点,就已经是个变通了,我不惋惜。

中华读书报:在又一次又一次回望过去、追溯历史的写作中,您获得了什么?

王安忆:我想最好不要用“回望过去、追溯历史”的概念来解释我的小说,从叙事论,小说永远是在写过去的时间,当然,科幻小说除外,我想,发生在50年内的事情,就不能成为历史,再则,《考工记》截止的时间已是两千年以后了;再从文类分,历史小说当然是指历史事件的写作,《天香》写的依然是日常生活,只是年代久远些,我还是个现实主义作者,贯穿我写作经

历过程,至今未改。

中华读书报:您的写作越来越节制了,举重若轻。比如写冉太太和陈书玉之间的感情,再多的惦念和关心,也是不显山露水的;比如写陈书玉和大虞等比兄弟还深的感情,也是节制内敛的。这和您以往的写作也大有不同。您觉得呢?

王安忆:确实,我写作越来越挑剔,希望有更好的细节,尤其语言,不容易使自己满意,我的要求是,雅俗共赏,所谓“雅”就是书面,所谓“俗”就是口语,冯梦龙整理的《山歌》《挂枝儿》一直是我追求的境界。

中华读书报:书中有一小节,涉节陈书玉家里窖井的一面铁盖,铜铸的空镜,一个散发女头像。这铁盖到底有何来历,陈书玉各处查询均没有找到答案。我在阅读中其实也希望有个答案,但是读完也没有发现就想,也许这里正另有暗指,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一处老宅藏有这么多稀奇珍贵的东西并不以奇?很想知道您的答案是什么?

王安忆:谈不上“博大精深”,我只是想表示,上海这地方,华洋杂居,东西汇合,实际上没有什么根基,那老宅子并不是特别宝贵的文物,但在近代城市上海,却是个稀罕物,它的风格也是混搭。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陈书玉和阿小的对话很有意思,似乎在回答一代人的疑问:诸如如何解释人人都要留城,将乡下去处罚?诸如为什么又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小说中处处暗含类似的玄机,作品并不太长,越读却感出地的厚重。这里,承载了您对于城市怎样的思考?

王安忆:阿小是陈书玉的年轻朋友,因校长的关系,也因时代缘故,他也要吸收新鲜的因素,我还交给阿小一个任务,就是推动陈书玉修葺老宅。



《考工记》,王安忆著,花城出版社 2018年9月第一版,42.00元

中华读书报:如果说《天香》和《长恨歌》一脉相承之处,是将笔墨重点放在女性成长历程和心灵史上,《考工记》的出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遍地英雄》中上海男孩韩燕来这位来自社会底层的都市边缘人的抗争和宿命。多年来,您在创作中不断突破,不断带给读者新的阅读感受,是不是胜券在握?

王安忆:《考工记》和《遍地英雄》在我的写作里有点例外,那就是写男性,我的小说大多以女性为主,男性人物不是所长,但这两个人物的特质已经远远超过性别的规定,再要纠正一点,“韩燕来”不能算作社会底层,恰恰是曾经的小康家庭,在城市扩大化中失去土地,他属于阶层更替中的失利者。我没有去“突破”什么,我一直延续写实主义的路数,从来没有超出这个范畴,只是努力向好罢了。

中华读书报:对于写作状态及节奏的调整和把握已经非常自然成熟,您觉得自己还存在写作的难度吗?上次关于《天香》的采访中您谈到材料的把握对自己构成难度,现在是不是有所突破?

王安忆:材料是永远的问题,非但不可能突破——因为它和处境有关,而且越来越困难,因为越来越严苛,写什么,是个大问题,可能对自己的期望在提高,对小说的期望也在提高吧!不像年轻的时候,似乎什么东西都可写成小说,幸而在那时候已经动笔,放在今天,也许就不会写了。到那座山唱哪支曲吧!

《重回1937》是一部非常感人的作品,它带有抢救的性质——与时间赛跑,与生命极限赛跑,与历史赛跑。

《重回1937》:与历史赛跑

■杜学文

两年前,蒋殊的一项创作计划得到了中国作协的重视,这就是深入当年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武乡,采访那些参加了抗日战争的老兵。对她的这项创作计划当然是充满了期待,这不仅因为山西是抗日战争的敌后根据地、战略支点,也因为蒋殊的选题是那些普普通通的老兵——在正史中难以留下姓名的人们。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老兵陆续离开了我们。所以,她的这一创作就带有了抢救的性质——与时间的赛跑,与生命极限的赛跑,与历史的赛跑。

《重回1937》是一部非常感人的作品。在本书还未成形时,最初几部分便在《黄河》刊发。读那些篇章,已被深深打动。这确实是一部有情感、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普通战士在特殊时刻的命运际遇,表现了我们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每个中国人,特别是那些普通人是如何抉择的,是怎样为了国家命运、民族未来奉献自己的。当年一群在田间地头劳作的青春男儿是如何放下锄头扛起

刀枪走向战场的,是什么促使他们为了国家舍弃小家的。任何人在静心阅读这部作品时都会流下真诚的眼泪。因为当我们面对这一鲜活的历史时,会受到强烈的情感冲击。不是说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失去了什么,而是说,会从这些人身上感受到一种精神,一种力量,一种气质,一种中国人能够克服各种艰难困苦,最终走向美好未来的发自内心深处的力量。当然,在这部作品中,我们也看到了蒋殊创作中的进步与变化。

蒋殊近年的成长与进步,我以为主要有这样几点。首先是她的格局在逐渐变大。作家格局的大小对其作品的品质至关重要。格局大小并不是说描写题材与人物的大小,而是说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思想深度、精神品格与情感世界。优秀的作家,即使是描写了许多细小的事物也往往透露出深远的品格。而格局小的作家,即使是描写大事件、大人物,也往往显得浅薄、细弱。如果单纯以蒋殊描写了所谓的“战争”题材,还不能说她

的格局在变大。这里,我主要强调的是,她在这部作品中关注的不仅仅是这些普通的战士经历了什么,而是比较详实细致地描写了这些战士的人生境遇。作者把个人的命运置于那一特殊的时代,使今天我们能够走进,感受到民族危亡时刻每一个人的生际遇。大时代与小人物的有机统一,是她创作的一个显著变化。这是一种积极的令人欣喜的变化。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蒋殊在这部作品中对个人存在的时代进行了比较多的表现,但她并没有忽略对人物行为、内心,以及由此而构成的命运的描写。在这种变化中,她并未失去一个女性作家“细腻”的叙述,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感人力量。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我认为在这部作品中,这种“细腻”的描写与“委婉”的叙述,要比此前的作品呈现得更好。因为她以前的作品,大都是写身边的人与事,相对而言更易抒情。而在这部作品中,社会生活的含量更为复杂。如要介绍清楚老

兵的家世,战争的发展态势,以及属于历史、军事、政治,甚至地理环境等诸多方面的特殊“话语”,都是一些见血、见肉、见骨、见命的“硬事”。因而,在承担这些相对复杂、与今天的读者有很大距离的历史“话语”时,往往会冲淡情感的抒发,以及描写的心境。作者必须克服这些不可回避的表达“障碍”,进入人物形象世界与情感领域。这对作家是个很大的考验。所幸的是,蒋殊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没有被这种“非文学”的知识概念淹没,而是极为自然地使之融化在作者的情感表达之中。读者仍然能感受到女性的细腻与深情。我们欣喜地看到,蒋殊在向宏大转化的过程中,细腻的东西没有失去,反而得到强化。这应该说是她创作中另一种积极的变化。

从这部作品中我们也可以感到,蒋殊的情感在个人向更深层的境界升华。面对这些老兵时,她的灵魂一定受到了洗礼。这种面对,其实是对一段民族历史的重新进入。这段历史对许多人来说是

陌生的,模糊的,概念性的,但对蒋殊而言却是具体的、鲜活的,有切身体验的——直到每一个生命,每一个细节,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具体的选择。进入这段历史,并且进入这段历史中每一个鲜活的生命,是一种挑战。当她面对历史时,也就面对着挑战。我觉得在那些一些时光中,她精神上是有着崩溃的。她无法平静地面对那些选择,她甚至感到自己唤醒老兵对过往的记忆是一种“残忍”。但值得欣慰的是,她还是战胜了自己——出于对历史的尊重,对老兵们命运的尊重。在后来,她生发出与时间赛跑的信念。她希望能够让这些处在生命最后阶段的战士们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印在了书上——这也许是蒋殊,以及我们这代人应该而且能够做到的事情。她觉得这是对历史的交待,是对这些曾经为民族、为祖国流过血的英雄的告慰。当这样的情感从蒋殊的内心涌动,并升华为一种信念的时候,她就真正地进入了这段历史,了解了这段历史,并通过老兵感受到民族所蕴



《重回1937》,蒋殊著,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8年5月第一版,48.00元

含的强大力量。这种情感不仅体现在她采访的过程中,当然还体现在她用文字表达的过程中。历史终将成为历史。那些当年青春年少战士——今天的老兵终将随着时光不可挽回地流逝。对此,我们毫无办法。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更多的东西留存历史,留住老兵。即使这些珍贵的存在离开我们,我们仍然有良知与道德,仍然可以通过包括“笔”与“书”这样的方式使曾经发生的一切留在今天。蒋殊就代表我们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也许,我们还应该做更多的事情。

皮皮冷静地记录了几十个生命临终的故事,这里面有无奈与绝望,也有爱与理解,想来这才是“死亡”面前的人间百态。个体生命的凋零需要尊严,渐行渐远的人与人之间需要和解。

渐行渐远的人生需要和解

■邢琳佳

皮皮的《渐行渐远》分为三部分,粗略地看其实是两部分:第一部分写作者的父母以及给作者人生很大影响的舅舅,第二部分则是异国他乡的故事。皮皮说,这些不是被她写成了故事的社会现实。也因此,我可以笃定这些故事能引起的不仅仅是读者的同情,还必然有相当的共鸣。

我曾把关注点放在对死亡的“遗忘”之上,因为深惑于《古诗十九首》里的“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怨恨生者对死者的必然遗忘。然而当我重新审视全书时,发现自己太过在意人的“死后”,就像大多数人一样在意“死后”,却不知关注逝者的“生前”。皮皮突破了这种固有的观念,她将目光完全投向了“生前”。我们往往关注人“死后”的会否被遗忘,大概从古至今

的国人都在考虑“身后事”“身后名”吧。但皮皮在书中却始终关注“生前”,尤其关注“生前”的有尊严。这其实是一个更加现实的角度,也是更值得我们作当下的思考的。

人类的医学发展让人有了延续生命的可能,但对一具已油尽灯枯的躯体的挽留,大概仅仅是为了安慰其他生者:

她依旧在昏迷中,被周围的机器拉扯着,各种管子要么插进她,要么夹住她,都为挽留她工作着……躺在机器中间的丁太太,软乎乎的一堆,宛如失去了主宰的某种物质,任凭机器操纵。

我们身边总有些老人,他们喜欢喃喃自语,大意总是,如今老成

了废物,不如早早死去,减少拖累;或是总爱向人回忆年轻的时光,回忆自己当年的能干,我们把这些抱怨和回忆都听惯了,他们还是孜孜不倦地像在讲一个旧的故事。他们是矛盾的,既想要同情,又想要尊重,然而努力一番得来的却是忽视。

其实我们真的不太懂得如何照顾和陪伴这些垂老的生命,就像我们无法想象自己年迈的样子。在《渐行渐远》的一段对话里,我似乎窥得了作者对自己的一点心思,也应该是我们对未来的自己的发问:

“你想过自己的晚年吗?”有一天,陈印终于激情地问了王禾。“有一天,你自己老了的时候,怎么办?去养老院?”

“看你说的,今年,我五十七

岁,晚年早就开始了……”

老年生活是在不知不觉中就开始了,是在我们自以为还年轻时就慢慢入侵的。《渐行渐远》不仅仅在描画老年人的生活情态,也不仅仅是关注老龄化的社会问题,它讲的是一个生命的永恒困惑:即使目睹过无数的临终生命,年轻的命也从来无法想象自己的老去。我们很少去思考这个必然的结局。

波德里亚说,生命太长了,长到给了我们错觉,以为死亡真是可以无限期推迟的。

皮皮冷静地记录了几十个生命临终的故事,这里面有无奈与绝望,也有爱与理解,想来这才是“死亡”面前的人间百态,是每一个鲜活生命走向枯萎时的不同命运,有

人倔强地拒绝命运的安排,有人从容地接受;有人想从命运那里偷来一点时光,有人则蔑视这刻意的努力;有人生活不易,有人难求一死……我们能看到的不仅是不同老人的生活状态,还有他们对自己老年生活的心情心态、与子女的爱恨矛盾。而我更希望读者思考的是:垂老的生命该如何才能体面而不失尊严地生活。这不仅仅是我们对亲人老去时应有的思考,更是对自己生命的思考。

许多死亡之后,似乎才明白:活着的人,哪怕是亲人,并不懂怎样关怀即将死去的人。

不懂如何关怀,其实是不懂如何尊重;不懂如何尊重,其实是没有以此观照自己的生命。我们因为无法想象自己的老去,故而在老去的人面前手足无措,甚至逃



《渐行渐远》,皮皮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年7月第一版,42.00元

避、推脱。直到这个老去的过程定格在死亡的节点上,我们才若有所失、嚎啕大哭。如果爱的和解需要死亡做铺垫,那么这种和解又有什么意义?作者对已逝父母的追忆,何尝不是对这种迟来的和解的追悔。

个体生命的凋零需要尊严,渐行渐远的人与人之间需要和解。